

十九世纪中期传教士对广州城的认识的变化 ——以《中国丛报》中的《广州介绍》为中心

崔玉洁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6032)

摘要: 从1757年到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的一口通商时间, 广州为清王朝对外交流的唯一口岸。西方人认识广州就是认识中国。《中国丛报》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华创办、旨在介绍中国的对外重要报纸。其中由本人创作的《广州介绍》详细介绍了广州城的历史与现状, 展示了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中期对广州城认识、态度的变化, 反映了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传播宗教思想继而改变中国现状的迫切愿望。

关键词: 传教士; 裨治文; 广州; 《中国丛报》

DOI: doi.org/10.70693/202609181622

19世纪中叶, 西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 对外扩张的道路迅速拓宽, 在全球内寻找殖民地。外国传教士趁机进入中国, 希望宣扬教义“拯救”中国, 而西方商人希望通过贸易打开与中国交流的大门。然而, 清政府未能看清世界发展大势, 限制外交往来, 开放广州口岸作为双方交流的通道。当传教士踏上这片土地时, 已意识到它与以往认识的中国形象大有出入^①, 并不是前人所吹嘘的理想王国, 于是希望通过《中国丛报》, 展现给世人以“最真实”的中国。

《广州介绍》(Description of city of Canton) 是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创作的城市介绍系列的首篇^②。共计有5次连载, 分别刊于1833年第2卷第4、5、6、7期和1846年第15卷第2期。《中国丛报》收录者简单对各章内容进行了概括, 谈论的内容广泛, 涉及了广州城的历史、建制沿革、官职设置、贸易往来、风俗文化等, 为研究广州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外文资料。

学界关于《中国丛报》的广州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③, 包括广州形象建构的认知、社会风习的研究与鸦片战争有关^④的研究。《〈中国丛报〉广州形象建构研究》从新闻学的角度出发, 在详细探讨了传教士构建广州形象的出发点和原因后, 得出尽管裨治文以自己所见所闻作为创作材料, 为了符合民族、阶级、国家立场, 这个“广州”并非全然真实的广州, 而是西方文化自我隐喻。但没有指出裨治文广州形象、对广州的态度前后发生过变化, 他所见之广州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形象。^⑤总的来看, 这些文章但对传教士关于广州的认识是碎片化的, 在深度、广度和多维度分析方面仍有拓展空间, 尤其是19世纪中叶传教士所能够认识和掌握到的广州各方面的情况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本文拟以《中国丛报》中的《广州介绍》为中心, 结合其他史料, 对广州城做

作者简介: 崔玉洁(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

①《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7页。

②Elijah Coleman Bridgman: Chinese reposi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832. 《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 第152页。

③黄涛:《论〈中国丛报〉的历史及其文化价值》, 唐都学刊, 2021年, 第5期, 第77-85页。李沛琦, 王元林:《外国人眼中的清代广州社会救济——以〈中国丛报〉为中心》, 暨南史学, 2018年, 第3期, 第127-135页。李静:《〈中国丛报〉鸦片报道研究》,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年。施宁胤:《从〈中国丛报〉看十九世纪上半叶西人对中国的地理认识》,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年。王化文:《〈中国丛报〉主要作者群研究》, 商品与质量, 2011年, 第4期, 第99-100页。张美娟:《裨治文与早期中美文化交流》,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吴义雄:《〈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1期, 第79-91、205页。仇华飞:《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历史档案, 2006年, 第3期, 第46-50、72页。刘煜琼:《西方人视野中的19世纪上半叶广东地理景观: 以〈中国丛报〉所见史料为中心》,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年。

④徐燕:《〈中国丛报〉广州形象构建研究》,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年。伊凡著, 张小贵、杨向艳译:《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广州见闻录》,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吴义雄:《〈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 《学术研究》, 2009年, 第9期, 第101-113页。吴慧珩:《〈中国丛报〉时事报道研究》, 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年。

⑤徐燕:《〈中国丛报〉广州形象构建研究》, 第38-39页。

一个全面细致的论述,旨在了解1840年前后传教士所能掌握到的、了解到的广州现状以及他们的对广州的态度,继而剖析传教士阐述广州现状前后发生变化的原因,由此,为深刻理解西方国家在这一时期采取何种措施影响广州,继而影响中国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一、《广州介绍》作者及创作的背景

裨治文,美国传教士,是《中国丛报》的主编、主要作者,同时也是《广州介绍》的作者^①。他抵达中国、继而在广州创刊,创作过不少以广州为中心的文章。本人创作风格比较严谨公允,《广州介绍》构建了一个繁华与贫穷、粗鲁又优雅、野蛮而文明的广州形象。

在第2卷第4期“广州历史与现状”中,裨治文谈及“世界上各个时代下的各个国家,大城市都对国家的道德、政治和商业命运产生了强大的控制性影响……在现代欧洲,‘这些微型世界’的影响非常明显。以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为例……‘它们必须被视为点燃了现代文明的火炬。’”广州不仅是中国连接西方的唯一口岸,还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城市,控制和影响的范围广阔而深远。以裨治文为代表的西方人认为广州如同现代欧洲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那样,也具有影响清王朝所辖之中国的能力,那么要想掌握广州具体影响的内容与范围,对广州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也就无可厚非。

二、传教士笔下的广州

长时间在中国生活使裨治文对广州的认识是层层递进、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里笔者结合时间,按照内容分而归之。

(一) 广州城的历史和位置布局

在第2卷第4期的开篇,文章先是简单说明了广州城目前的名字以及地理位置。裨治文对广州城重点关注的三点,一是通过虎门这个内河入口可以航行到黄埔港,然后抵达广州城;二是城市西南部有外国工厂即十三行;三是城市本身包括城墙内外所有部分的面积不大,但是人口众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它的国内外贸易。

广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第4期广州的历史与现状里,裨治文参照了中国古籍的记载回顾了广东省的建制沿革,但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且与史实有所出入。不过他在文章中大体交代了广州由大向小发展的政区范围,对广东省广西省名称有了进一步的解释,认识到广州市从古就与周边地区联系紧密。另外裨治文察觉到了广州与中原王朝之间复杂的关系,多次描写地方与中央的冲突。

广州城包括城墙、门、街道。广州城几乎呈正方形,中部有东西向城墙将其分为北部旧城与南部新城,城墙以石为主、部分为砖,已见失修;北墙最高最固,是因“敌军最有可能朝那个方向进攻”。^②城墙上每隔几英尺就有炮眼。城内还有“翼墙”,即短墙,一处是在东南角,另一处是在西南角,向外延伸,用途是堵住城墙与城壕之间的空间。每道翼墙上都有一座城门。城门一共十六道,四道穿过新旧城墙,外城就只有十二道门,广州城城门由南海、番禺两县分管。街道众多,裨治文提到街道目录有六百多条,他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除了几条长街,绝大多数的街道都很短并且弯曲。运河发达且繁忙,商业贸易充斥其间。郊区也在介绍范围之内,总体上言,在南部,郊区充斥了城墙到河流之间的整个空间,东部面积小于西部,北部稀少,郊区与城内市区在面积和人口上几乎等同。

这幅地图反映的是广州市区和郊区的布局。地图的来源,据裨治文解释是由于没有准确的广州地图,所以采用了当地人绘制的地图的复制品,去掉了汉字,用罗马字母进行了标注。图上所标分别是:a.珠江 b.十三行 c.清真寺(今怀圣寺) d.宝塔(今六榕寺) e.五重塔(镇海楼) f.总督府 g.巡抚宅 h.将军府邸 i.海关总督 k.府学宫 l.布政司官邸 m.堪察司官邸 n.盐务司官邸 o.贡院 p.育婴堂 q.天字码头。

每个标注配有一段解释,在a.珠江标注里,有两座堡垒,分别是法国堡垒,位于城市东南角,也在图的东南角方向;另一座是荷兰堡垒,在十三行的西面,更靠近河流的上游。但没有具体提到堡垒的作用。从标注的顺序上看,珠江、外国工厂是首先得到裨治文关注,接下来是一些宗教建筑,紧接着才是行政办公机构的位置,再到公益机构和刑场码头,叙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珠江、外国工厂与贸易挂钩,对宗教建筑挥墨是传教士的职业习惯,紧接着是政府官员的宅邸,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传教士对统治阶层的重视。裨治文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

①王化文:《〈中国丛报〉主要作者群研究》,第99-100页。

②《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163页。

广州城内,但也没有忽视与城面积、人口几乎等等的郊区,这是他文章的一个特点。

“广州的建筑无疑具有多种多样的结构和风格,是整个帝国中中国品味和艺术的典范。”^①城市和郊区都建在低地或者平地上,河边房屋建在木桩之上,有地基的要比没有地基的房屋牢固很多。整个城市的四分之三左右由砖块建造,其他则有泥土建造,石头和木头并不常用于房屋的墙壁。地板很多由硬化的泥土组成。建造房屋很少用铁。建筑材料价格低廉数量充足,采用河道运输的方式。房屋和寺庙很少有多层的,门廊上面会刻有一些铭文。房子后面为女性居住的场所。俗世建筑并不能完全反应贫富情况。富人跟中产阶级的房屋在外观上不相上下^②。但仍存在巨大的阶级差异,具体表现为比较富裕的家庭,居住的房屋墙高至遮蔽里面的建筑,不让外人看到,里面则有装饰品和优雅的布局。皇家建筑为“万寿宫”,位于新城东南角附近的城墙内。墙壁和附属物都为黄色,代表皇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慈善机构的建筑如育婴堂、麻风院等,其特点是建成时间少,数量少,规模小。裨治文介绍的宗教建筑和场所数量可观,共有124所。着重讲了“Honam jos-house”,即河南寺(今海幢寺)的故事。其反映了佛教在此地与世俗王权、士绅之间力量的角逐。此外公共祭坛(祭祀自然神)并没有算进去。其他宗教信仰行为和活动饱受裨治文的诟病,他认为这群建筑和民间信仰、中国宗教浪费人力物力,“就像人体内的肺结核一样,它吞噬着生命体,缓慢而稳定地摧毁着整个系统”^③。不论图上还是裨治文的介绍里都没有看到基督教或是新教宗教活动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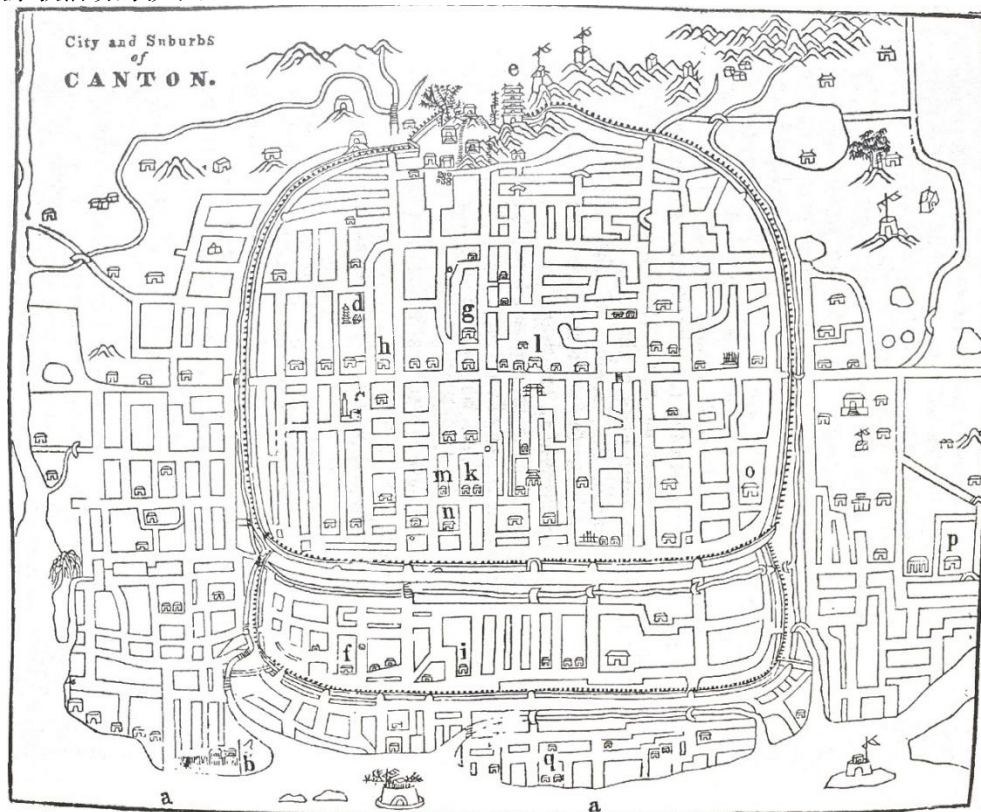


图1^④ 广州市区和郊区

(二) 官制、科举

裨治文粗略地爬梳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的建制沿革。上起传说的尧时期,下至清,广州的范围越来越具体,行政机构越来越丰富,人员构成越来越复杂。里面值得注意的共有三点,第一点是广东省、广州市的政区变迁问题,第二则是广州清代官员的构成以及职权。第三是科举制度对官员、学校、社会的影响。

广州清代官员的构成以及职权这一部分见于第5期和第6期。第5期涉及广州地方官员官俸。共介绍了12位重要官员,分别是“Leäng Kwang tsungtuh”两广总督,两广总督权力巨大,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

①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第203页。

②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第167页。

③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第270页。

④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第168页。

例如, 两省的所有最终的上诉由他处理。裨治文生动地描写了这一上诉过程: “总督府门口放置着六块牌匾, 上面写着希望向总督上诉的人的相应铭文: 第一块是给那些被贪婪、腐败或卑鄙的官员冤枉的人; 第二块是给那些遭受小偷小摸的人; 第三块是给那些被诬告的人; 第四块是给那些被骗子和赌徒伤害的人; 第五块是给那些遭受过各种恶人伤害的人; 第六块是给那些想举报任何秘密计划或阴谋的人。每月的三、八、十三、十八、二十三和二十八天, 人们可以拿着这些牌匾, 进入宫殿的外室, 在那里亲自向总督提出申诉。这种程序模式很少被采用。将请愿书送至或带到他的门前, 是向总督寻求补救的最常见方法。当所有这些方法都失败时, 可以向北京上诉。这种进入地方官门外的上诉方式, 在巡抚和按察司的办公室也允许使用。”^①; “Fooyuen”、“seun-foo”巡抚, 巡抚兼职众多, 不受总督限制; “Tseangkeun”将军; “Huekwan keëntuh”海关大臣; “Heöyuen”; “Pooching sze”布政司; “Ancha sze”按察司; “Yenyun sze”盐运司; “Tuhleäng taou”; “chefoo”广州府知府; “Nanhae heen cheheen”南海县丞; “Pwanyu heen cheheen”番禺县丞。并对他们大致获得的官俸进行了估计和阐述。

裨治文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行的怪异之处: “很难确定他们各自范围的确切界限……乍一看, 这么多物体都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运动, 我们感到惊讶, 它们没有立即发生碰撞, 相互毁灭, 并给整个帝国带来毁灭。然而, 经过仔细观察, 我们能够辨别出一些控制这个复杂系统、维持它的存在和运转的秘密法则。两种影响, 一种是军事, 另一种是文学, 也许是调节和控制中国政府措施的主要力量。”^②他认为, 官员之间的职责彼此交叉重叠却没有引起混乱的原因应归结于科举制度。

第6期介绍了广东文士科举考试、学校教育。肯定了裨治文科举制度的价值, 是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可以通过科举制度, 在无需推翻当权者的条件下开辟一条前往帝国最高位的道路, 只有王位例外。“学识是所有渴望在国家中占据信任和权威地位的人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它一定会赢得尊重、影响力和声望”^③。作者也意识到了这种制度背后畸形的从属关系, 就是通过科举出身的人的富贵贫贱都依赖于皇帝的意志, 他们的荣誉一直处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接着裨治文介绍了严格的考试制度, 对它开办的时间、地点、人员、考试内容、违规惩罚、考后庆祝活动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参加广州考试的数千名考生只有七十一人获得了功名。功名不仅名额少, 竞争也是相当残酷。学校教育当面, 国家教育是要选拔人才, 但“广州的大多数学校只是为了让年轻人为私生活的一般职责做好准备。”^④尽管国家有政府任命的老师, 但是没有公立和慈善学校; 几乎每个学生都是在私立学校中开始他的课程的。学习的内容是《三字经》, 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只停留在这一阶段, 停留在仅仅识字的阶段。继续学习的人会接触《四书》, 然后是其他经典, 算数、地理和历史不在教育范围内。有高中和学院, 但贫穷且不宜用于教育。“高中有十四所, 与英国和美国的私立文法学校有些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几乎没有学生。有三十所学院, 其中大部分是几个世纪前建立的。其中几所现在已经荒废, 正在倒塌。最大的三所学院各有大约两百名学生, 而其他三所学院也一样, 只有一两名教授。”^⑤这里提到的学院应是具有私人性质的类似“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机构, 这段说明了一直到1833年, 这种学院都没有发展成为重要的教学机构, 反而有衰落之势。学校的纪律规则作者认为尚不清楚, 但是书本里面保存有保持身体健康的体操系统。

尽管教育形式多样, 但“是广州人口中识字的数量不到一半, 受教育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整个城市几乎没有一所女子学校。公众反对女性接受教育, 但也有人反对这一行为。”^⑥裨治文还特别提到了书籍机构。广州没有公共图书馆, “但制造和销售书籍的机构却很多”^⑦, 书籍流通量巨大, 因为无法满足需要, 存在着大量流通的图书馆, 但其中书籍几乎都是坏书。

(三) 军队系统与军力

在裨治文的认知中, 陆军和海军司令与总督、巡抚既保持独立性, 彼此之间又相互牵制。全省的陆军和海军数量在名义上有10000人^⑧, 只有少部分驻扎在城内。周边遍布堡垒。河内的两座堡垒“是周边堡垒的典范”。但无论是省城的防御性城墙还是周边设置的堡垒的作用有限, 甚至大部分在暴雨中损坏无法防御, 现在“最令人畏

①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 第211页。

②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 第216页。

③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 第250页。

④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 第257页。

⑤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 第259页。

⑥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 第260页。

⑦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 第260页。

⑧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第1册, 第217页。

惧的莫过于在舷窗上用木盖画的虎头图案”；骑兵炮兵“对此知之甚少，见所未见”；鞑靼军队“有 200 名精选士兵……但一般来说，士兵装备很差，纪律很差。他们所有的盔甲和装备，包括盾牌和头盔、弓箭、长矛和标枪、短剑和火绳枪，似乎都不适合防御或进攻。

雷州战争的失败，使裨治文对中国陆军海军，乃至整个中华帝国的军事实力有了定性。第 6 期开头，“帝国军队除了数量庞大外，没有什么可怕的”^①，警察更是毫无作用。作为大清帝国的军队，广州乃至全国的实力都十分孱弱，是传教士都深知的。上至八旗子弟，下到雇佣的地方维持治安的军队，这个庞大帝国所建立的军事武力系统是无力抵挡外来冲击的。

（四）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贸易的占比

广东因地理位置以及在清朝独特的经济地位，在内外贸易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据裨治文的介绍，不仅与中国往来的国家多，中国内部城市也必须通过广州进行贸易。他抽取了庞大贸易中的几个分支进行介绍。并且还详细列出了贸易的情况、环境，以及从事贸易人员的评价。目的是展示广州贸易的规模和它的重要性。

中国贸易方面，裨治文为首的传教士主要关注各省份的位置和居民数量，了解贸易有何优势，未来贸易可能出现的新变化。介绍顺序是沿海，北部，西部，南部边境，最后是中国中部省份。特别注明了不考虑殖民贸易^②。人口依据 1812 年《大清会典》给出的人口整数，在第 1 卷第 359 页展示^③。根据裨治文提供的省份、货物、人口，现制表如下：

表二^④ 国内各省份人口与进出口物品贸易表（部分）

省份	人口(万)	出口商品	进口商品 (包含国内外商品)	现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广东	1900	丝绸、大米、鱼、盐、水果、蔬菜木材、银、铁、桂皮、槟榔	所有外国进口商品（自身消耗大部分商品）	更多的出口供应
福建	1400	樟脑、糖、靛蓝、烟草、纸张、漆器、优质草布、矿产品	木材、羊毛和棉布、葡萄酒、手表	转运花费太多，需要开放口岸
浙江	2600	丝织品、纸张、扇子、铅笔、葡萄酒、枣、“金华”火腿和龙井茶	外国进口商品(需求量大)	运输成本高，需要采取措施
江南(江苏和安徽)	7200	绿茶、丝绸	进口货物	是农产品和外国商品集散地
山东	2800	水果、蔬菜、药材、酒类、皮革	粗布	本土船只运输，价格昂贵
直隶	2700	人参、葡萄干、枣、兽皮、鹿肉、酒、药、烟草	布料、钟表、手表和其他杂货	生活必需品依赖它省和他国

这份资料据裨治文介绍，其来源于本地的手稿，官方文件并没有找到。这份文件反映的每年从帝国各省运出和运往这些省份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裨治文认为其只能被视为接近事实。裨治文还隐晦地指出了鸦片贸易正在悄然进行：“一种商品甚至没有被提及，这种商品已知运往所有省份，每年的贸易额超过 1200 万美元。”^⑤上表种种让裨治文意识到了只有广州作为贸易之地对外国人和其他省份之人不利，因为其他省份需求或多或少都有所增加，清政府却阻止他们直接同中国境内贸易。此外他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上面，指出这些省份目前或者未来可能有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其开放港口的具体需求。同时裨治文也指出，即便开放北方港口，并不会影响广州贸易地位的重要性，因为“这群外地人并不局限于国内贸易，他们还会参与到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当中”^⑥，广州是中国对东亚、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港口。

紧接着就论及外国贸易对华（以广州为口岸的中国）情况。参与贸易的国家中值得重视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的与华贸易。中英贸易、中美贸易是裨治文论述的重点。英国在 1635 年与中国进行贸易，但在此之

① 《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 1 册，第 249 页。

② 《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 1 册，第 298 页。

③ 补充：用的是表中乾隆十七年的数据。《中国丛报（1832.5-1851.12）》卷 1，第 364 页。

④ 《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 1 册，第 298-301 页。

⑤ 《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 1 册，第 301 页。

⑥ 《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 1 册，第 301 页。

前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即1599年,曾托探险队送信给元朝统治者,“试图争取某些特权”^①,不幸的是船没有到达目的地。1634年,果阿(Goa,今印度属地,当时由葡萄牙殖民)总督与英国商人达成协议进行贸易,当时前往中国的英国船长认为“只需给澳门总督带信就足够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协助他在广州与中国人交流”^②,并讲述了英国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经历。^③英国通过战争手段逼退葡萄牙,成功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由此,中英贸易构成了世界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葡萄牙不仅控制了果阿,而且与澳门总督关系密切。英国人可以通过葡萄牙跟澳门总督的关系,继而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二是英国人以一种非法的方式第一次进入广州河道,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文章详列了1832年英国与华贸易船只数量,交易货物名称,最后附上1828-1833年来英国对华贸易表。

表三^④ 英国对华贸易额统计表

季节	进口 (美元)	出口 (美元)
1828-29	21,313,526	19,360,625
1829-30	22,931,372	21,257,257
1830-31	21,961,754	20,446,699
1831-32	20,536,227	17,767,486
1832-33	22,304,753	18,332,760

美国对华贸易开始于独立战争后不久,下表为美国对华贸易表。数据从何而来裨治文并没有提到,但大体上可以看出中国在两国贸易中并不居于劣势地位。裨治文将外国对华贸易总结为,对华贸易是现代商业的重要分支。但是这种贸易一直是在一种没有条约保障、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是“由于帝国对四海的恩惠”,贸易才得以蓬勃发展。^⑤

表四^⑥ 美国对华贸易表

季节	进口 (美元)	出口 (美元)
1805-06	5,326,358	5,127,000
1815-16	2,527,500	4,220,000
1825-26	3,843,717	4,363,788
1830-31	4,223,476	4,344,548
1831-32	5,531,807	5,999,731
1832-33	8,362,971	8,372,175

因为存在对外贸易,所以在广州也衍生出了相关的从业人员和规章制度。从业人员分别为担保商人(行商),语言学家以及买办,这三种职业人员会共同参与到贸易当中且不可或缺。除此之外,商船想要进行贸易需缴纳港口费,港口费又包括测量税、运货税、引航费、译员费和买办费,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的费用是较为固定明确的。海关大臣一般负责管理和监督。外商船只的目的地只能是澳门、广州,但实际上它们也在内伶仃洋找到了不被驱逐的停泊地。所有贸易包括鸦片贸易都在这里进行;商船想要进入虎门需要引航员和海关的许可证,最后停泊在黄埔港。^⑦广州十三行。由外国人经营。占地小,并且集中分布。

(五) 居民人口和性格特征

裨治文认为广州人最突出的特征是“商业性”。广州的制造业依托于佛山。纺织业颇为庞大,每年有约17000人^⑧在这里从事编制丝线的活动,50000人进行布料制造。广州的店铺约有2500家,鞋匠人数大约4200人;理发师约7300人、从事医药行业的人数不少于2000人,还有一类人生活在船上,即蛋家,统计范围内的船只数量达84000只。广州人口因为南海、番禺行政交叉,人口无法被完全统计。裨治文依照上文以职业划分人口集成的

①《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03页。

②《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04页。

③《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04-307页。

④《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08页。

⑤《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09页。

⑥《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09页。

⑦《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11页。

⑧原文为17000 thousand person,疑似错误,《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13页。

数据乘4倍计算^①，估计广州人口大约在1236000人，是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

在第2卷第4期追溯广州历史时，裨治文敏锐意识到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冲突下逐渐凸显出来的居民性格特征。例如在清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广州因为剧烈反抗，遭到大屠杀^②。1846年出版的第15卷第2期，他毫不避讳地认为“举止粗鲁，暴力横行”形容广州市民，举例了广州人喜欢打架的情况。这是他认识到了广州当地居民性格比较暴烈，极难驯服。这种性格为接下来《南京条约》要求开放广州城的要求施行受阻埋下了伏笔。第15卷第2期，本篇报道引用了《中国邮报》关于开放广州城与广州外国人待遇的相关官方文件。“（《南京条约》推行后）四个港口都保持着安全和平静……但不幸的是，在广州，弊端远不止是将人驱逐出城……我希望我们目前的友好关系能够继续下去，这让我渴望以最不令人不快的方式敦促双方在为时未晚之前完成在广州的条约约定。”^③《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了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在条约推行的过程中，尽管其他四个口岸有所反抗，但裨治文认为都没有广州这般剧烈，广州城有推迟外国人进城的行为，还会在日常生活中对抗外国人。裨治文这样写有其目的所在，因为他发现了“这些卑鄙、恶毒的感情最近在广州的绅士和人民中得到了充分发展”^④，考虑到士绅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为了扩大中国市场、传播新教，他认为应该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否则“他们就会长期坚持反对外国人进入这座城市。”^⑤但这种情况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第15期第2卷出版的时间，究其原因，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已凭借武器侵入中国，挤占中国市场，胜利者的心态促使他们反对来自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歧视。

三、《广州介绍》叙述前后变化原因

1833年第2卷第7期的末尾，裨治文回答了广州对中国性格和前途的影响^⑥，他认为商业构成了广州人最重要的基因，“商业”带来了不良品质；而“文明”是与西方人接触的结果，并且他认为这种结果可以推行到全中国人的身上。但是目前这种交流停留在商业上，其他方向诸如科学、艺术、社交都被忽视掉了。

总的来看，《广州介绍》涉及方方面面，介绍由浅入深，包括城市沿革、贸易往来、行政机构、建筑风俗、居民性格等等。从时间的先后上看，《广州介绍》从第2卷的第4期（1833年8月）开始到第15卷第2期（1846年2月）结束，长达12年的时间，从文章连载的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1833年前后，前期论述范围广泛又专业，具有代表性，论述比较客观；后续不仅时间上晚了12年，而且只有1篇，创作风格也与之有很大不同，表现为侧重细节微小的方面，也揭示了外国与中华帝国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冲突，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情绪和看法。这些变化跟裨治文的身份和亲身经历密切相关。

裨治文作为传教士创作《广州介绍》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布教，扩大与华贸易，广州作为他在中国能够接触的、长期生活的第一个大城市，挥墨不可谓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广州、对中国的认识越发深刻，鉴于广州“恶劣的条件”、中国排外的态度，他追求平等地、不遗余力地于广州布教。到了1846年，中国社会因为鸦片战争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不再希望以一种平等的方式促进双方交流，于是各种各样的诉求就通过行为、语言表现出来。裨治文作为西方传教士深知这一点，开始以“平等”的诉求驳斥广州人的性格缺陷，宣称正是由于西方人带来的优秀品质“感化”了中国人，想借以达成传道、为殖民贸易扫清障碍的目的。尤其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英之间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关于中外冲突他秉笔直书，并否定他文章里其他传教士“认为广州是最不受欢迎的传教站，而中国是最没有前途的传教区的观点”^⑦。作者希望尽可能地剖析广州历史与现状，施加对广州的影响，继而影响中国。也正因为如此，《广州介绍》内容详实，较为客观，前期和后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态度。这为了解这一时期西方人对广州城、对华措施、态度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四、结语

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认为，自18世纪中叶开始东西关系呈现出两大主要特征：欧洲社会东方知识的日益增长和系统化；欧洲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总是处于强力与优势地位。倚仗着这种强势地位而来的是，

①原文“假设上述提到的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结果可能相去甚远”，但还是以4倍计算人口。

②《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160页。

③《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4册，第69页。

④《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4册，第66页。

⑤《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4册，第66页。

⑥《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1册，第316页。

⑦《中国丛报（1832.5-1851.12）》第4册，第74页。

作为参照对象的东方在西方的描述下成为意识形态与霸权主义的载体。彼时的西方话语渗入了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 这些话语及其形成的机制成为了萨义德所概括的东方学, 也就是“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 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①

裨治文在中国生活超过 20 年, 去过广州、澳门、上海等地, 在广州生活超过 13 年, 对广州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自他创办《中国丛报》以来, 始终坚持以传教士的身份认识中国、向外国介绍中国, 同时也以殖民者的身份代表本国在华谋取利益, 为西方殖民者争夺话语权。宗教和现实利益的双重驱使, 使他创作出了《广州介绍》, 其创作描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创造了一个集学识与文盲、开放与歧视、繁荣与贫穷、庞大又赢弱的全面的广州、中国形象。其中虽然有失偏颇的部分存在, 但为当时西方认识中国提供了新的重要途径, 一些客观描述为了解这一时期广州、中国社会的各层面提供了一个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中国丛报 (1832.5—1851.12)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2]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Chinese reposi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832.
- [3] 吴义雄.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79-91, 205.
- [4] 徐燕. 《中国丛报》广州形象建构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5]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4.

The Changes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aries' Understanding of the City of Guangzhou—Center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city of Canton" 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Yujie Cui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 Zhou, China

Abstract: From 1757 to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 in 1842,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ngle-port trade system, Guangzhou was the only port through which the Qing dynasty conducted foreign exchanges. For Westerners, to understand Guangzhou was to understand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as an important foreign-oriented newspaper founded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with the aim of introducing China. Among its contents, the "Description of city of Canton" written by Bridgman himself ga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ondition of the city of Guangzhou, displayed the changes in missionaries' understanding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nd reflected the urgent desire of the West, as represented by missionaries, to open the Chinese market, spread religious ideas, and thereby change China's existing condition.

Keywords: Missionaries;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Guangzhou; *The Chinese Repository*

① 萨义德著, 王宇根译: 《东方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 第 4 页。